

浅谈 1918 年俄语拼写法改革

罗学鑫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俄语拼写法改革 (орф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реформа 1917—1918 годов) 是发生在十月革命前后的俄语书写改革运动。但是俄语拼写法改革并不是一朝一夕的成果, 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拼写法改革经过几代人的酝酿终于在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时代被搬上了历史舞台。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1918 年拼写法改革始终处在暴风雨般的舆论漩涡中。笔者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能够简单回顾一下 1918 年拼写法改革的始末和其所引起的广泛思考。

关键词: 俄语拼写法改革; 文字简化; 文化传统

中图分类号: H351

文献标识码: A

1. 1918 年俄语拼写法改革的背景

在我们的印象里, 1918 年俄语拼写法改革就应该与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府联系起来。在苏联科普作家的笔下, 旧的拼写法是旧俄国的余孽, 1918 年俄语拼写法改革被认为是苏维埃政府的一项功绩。但是某种程度上拼写法改革的创建者并不是列宁或者卢那察尔斯基。在《消息报》和《真理报》等报刊执行和广泛传播新的拼写法之前, 拼写法改革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可行性讨论和充分的准备。

早在 18 世纪, 在俄罗斯科学院 (当时还称为彼得堡科学院) 就已经不止一次提到了俄语特别是书面语的改革。当时的革新者彼得大帝构想过关于俄语拼写法的改革, 但是这个帝国性的计划最终没有付诸于纸上成为强制性的行政命令。1735 年俄罗斯科学院曾考虑取消字母 *v* 的使用。1781 年在俄罗斯科学院的倡议下, 在供读者阅读的《学术新闻》中俄文单词并没有印刷上词尾的 *ь*。俄国最后一位皇帝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 整个俄国都在有意识地进行语言改革和简化俄语书写。1904 年在著名的俄罗斯语言学家 Ф.Ф. 福尔图纳托夫的领导下, 俄罗斯科学院内部成立了拼写委员会¹, 同年, 以“初步报告”的形式讨论了拼写法改革的问题。语言学家们考虑到简化语言会使中学生更容易掌握俄语的书写。1911 年科学院召开了特别会议, 基本认可了拼写委员会的工作, 并发布了有关该主题的决议: 要求委员会尽快阐述改革的主要内容, 相应的改革方案将于 1912 年正式颁布。该改革方案废弃了部分拼写规则——在字母表中剔除了 *ь*, 在一些动词和名词后面不再添加软音符号, 比如 *любишь*→*любиш*, *ночь*→*ноч*, *мышь*→*мыш*²。

改革方案出台以后, 出现了一些用新拼写法印刷的单行本 (比如 П. Е. 斯塔扬的译著)。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量著作改用新的拼写法成书、付印, 比如俄国著名世界语学者 П. Е. 斯托扬在 1914 年翻译的一些由世界语学者阿贝兹古斯创作的故事。1917 年 5 月 11 日, 拼写法改革方案以“俄语拼写法简化研讨会最终决议”的形式正式由俄国临时政府官方对外公布。

5月17日，临时政府公共教育部根据这些材料要求各地区的督学立即改革俄文的拼写，并在6月5日再次下发了相关命令（第一次官方出台命令推广新拼写法）。

十月革命后不到两个月，列宁要求A. 卢那察尔斯基院士引入新的拼写法来强化布尔什维克人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于是1918年1月5日，一份由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委员A. 卢那察尔斯基院士起草的关于推广新拼写法的命令刊登在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机关报刊《工农临时政府报》（Газета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абочего и крестьян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23. 10. 1917）上，宣布自1918年1月13日（俄历1918年1月1日）起所有政令和政府出版物，报刊杂志等都要以新的拼写法编印发行。政令实施后第一份按照新拼写法拼写单词的出版物是《工农临时政府报》（Газета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абочего и крестьян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03. 01. 1918）。这份报刊严格按照新拼写法拼写每个单词，尤其是字母ъ只用于音节划分而不再出现在词尾。当时在布尔什维克控制范围内，并不是所有杂志都按照新拼写法拼写并出版。当然，某些报刊对这个政令执行得更加“彻底”，比如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消息报》，苏共机关报《真理报》，里面一个字母ъ都没有，一旦需要音节划分，就使用撇号代替ъ，类似于乌克兰语。

2. 1918年俄语拼写法改革的内容

1918年俄语拼写法改革对当时旧俄语的拼写法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首先在字母表中去除了字母Ъ (ять), Ѡ (фита)³, І (и десятеричное)，相应地，在原来被废弃的字母的位置上用字母Е, Ф, И分别来进行替换。

在词尾和复杂词词间不再使用ъ，但是在一些词中ъ作为分隔符号被保留了下来，比如подъём, адъютант。在旧的拼写法中ъ出现在任何以辅音字母结尾的词的最后，比如столь, телефонъ, Санктъ-Петербургъ，这其中也包括唏辅音（例如ж, ш），比如мячь, ужъ, замужь。但是其中不包括以й结尾的词，因为й在当时被认为是元音，而与1912年改革法案不同的是，1918年改革保留了那些在词尾的软音符号，比如олень, мышь, сидишь。

以字母з和с为结尾的前缀（如из-, воз-, раз-）的书写规则发生了改变。新的拼写法规定，在任何清辅音前面的前缀都以с结尾，比如разступиться→расступиться，而在元音和浊辅音前面的前缀则保留з，比如разбить→разбитъ, разораться→разораться。

在形容词、形动词第二格和第四格的词尾中-аго, -яго变为-ого, -его，比如новаго→нового, лучшаго→лучшего, ранняго→раннего。在第一格和第四格形容词的阴性和中性的复数形式中-ья, -ія变为-ые, -ие，比如новья→новые。

复数阴性代词онѣ (她们)和однѣ (一些女人)的词形在新的拼写法中变成了они和одни，同时однѣ的间接格也进行了相同的变化，如однѣхъ→одних, однѣмъ→одним, однѣми→одними。

单数阴性代词ея的第二格的词形变成了еѣ (неѣ)。

在现在广为人知的版本中，拼写法的改革不仅影响了拼写，而且还影响了发音和语法。因为однѣ, онѣ, ея的写法（教会斯拉夫语的拼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顺利进入了俄语的发音系统，尤其是在诗歌中，它们会参与押韵，比如普希金的诗歌中的онѣ, женѣ；在丘特切夫的诗中的моя, нея。

在1917—1918年的拼写法改革的文件中并没有提到在1917年之前就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生活的字母ѵ。这个字母仅仅出现在少数几个宗教名词中，如ѵподіаконѣ, ѵпостась。这个字母来自希腊语，它对应的是希腊字母ϒυ。在改革之后，它也从字母表中消失了。

在这里笔者还想简单地介绍一下字母ѣ。ѣ早在1795年就被发现已经在一些印刷品上出

现了，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ѐ是因为1797年历史学家卡拉姆津（Н. М. Карамзин）在自己的编选丛刊《敖尼德》（1796—1799）中把io变成了ѐ，文选在读者之间流传很广，而ѐ也开始被大部分人所熟知。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1918年拼写法改革剔除了很多古体字母，但是并没有涉及到字母ѐ的改动，因为当时的苏联政权认为ѐ已经进入到太多人们常用的单词中，以至于没办法被改动。而在二战时期，1942年И. 斯大林有一次翻阅了一张缴获的德军描述苏联地名的地图，他感叹于德军制图过程中对俄语地名考据十分仔细。同年10月24日苏联国民教育委员会颁布法令——所有的学校教材、杂志报刊、书籍手册等印刷品上都必须正确地标注ѐ。顺便提一下，这条法令至今没有被废止。但是14年后在Н. С. 赫鲁晓夫的倡议下新的更加简化的拼写法规则也慢慢流行了起来——在文献书籍中ѐ逐渐被е所取代。

3 激辩中的1918年俄语拼写法改革

事实上自1912年俄罗斯科学院颁布拼写法改革的相关方案以来，围绕拼写法改革的争论就始终没有停止——“改革并未完善”“没有人有权力在既定的拼写法规则中用如此粗暴的方式进行改革”“新的拼写法会导致所有现行的中学教材都需要重新翻印”“那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卡拉姆津、普希金、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也将面临重新翻印的命运”等声音不绝于耳（Н. Кульмана 1912: 207—208）。

在革命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从事拼写法改革的语言学家们是没有任何政治诉求的。事实上大规模的改革与普及新拼写法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进行的。而这也引来了那些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的尖锐批评。对此，著名的俄罗斯作家И. С. 布宁曾有过类似地描绘：“我将追随大天使米哈伊尔的手谕，永远不会去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拼写法。至少有那么一个原因，那就是人类的手永远都不能用那种拼写法写出什么东西。”（И. А. Бунин 1988）在新的拼写法推行的前几年，它并没有立即运用到大部分的印刷品上。在当时白军控制地区的印刷品中和那些海外的移民中间还是运用着俄语旧拼写法的拼写规则。直到1940—1950年间，境外的俄语印刷品才大规模地转换成了新的拼写法，而这一切又与苏联时期的第二次移民潮有关，尽管其中有些印刷品仍沿用着旧的拼写法并出版至今，比如俄罗斯境外东正教廷的会议记录的书写还是按照革命前的旧拼写法的书写规则。

新的拼写法改革也受到了一些来自语言学上的批评，Т. С. 特鲁别茨科伊曾提出，新的拼写法改革并没有充分消除旧拼写法中书写规则不一致的现象：

在我看来，已故的沙赫马托夫最大的错误在于，他用自己的权威为新的拼写法背书。但是隔音符号很难令人苟同（под’ем, дьячек——这里指存在多种隔音方式，用撇号或者ъ，事实上ъ也是隔音方法的一种），并且总的来说，这并没有比改革前好多少：主要问题是基里尔字母没有一个确定的字母，表示隔音符号，这个问题在新的拼写法中仍未解决。（1921年2月1日特鲁别茨科伊写给Р. О. 雅克布逊的一封信）

特鲁别茨科伊认为在拼写法改革中应该广泛地使用撇号，但是实际上真正保留了隔音符号功能的是ъ。

而著名的拼写法改革批评家И. А. 伊里因曾对1918年俄语拼写法改革提出过语言学上的批评：

“在停止есть/ѣсть, миръ/міръ[миръ（和平）和міръ（世界）]的使用之后，同形异义词和同音异义词的数量会增加，会降低俄语的准确性。”（著名的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和平”是миръ。）

此外还有来自社会政治层面的批评，这就完全上升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曲解？这令人神志错乱的倒退又是图什么？谁会去需要这种思想和语言创造力上的混乱？

答案只能是一个：这一切是俄罗斯民族的敌人所需要的。他们，正是他们，只有他们需要。

……

我记得在1921年，我去问了马努伊洛夫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引入这种丑陋的东西；我记得他没有捍卫自己过去的所有努力，他提到了格拉西莫夫的一贯要求。我记得在1919年，我向格拉西莫夫也问过同样的问题，他指的是科学院（的要求）。他在发泄一种极端粗鲁的愤怒，以至于我转身离开了房间，我不想让我的客人们离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格拉西莫夫是某个国际组织的成员。（И. А. Ильинъ 1956: 434—437）

象征主义诗人В. И. 伊万诺夫从美学的角度批评了改革，他指出旧拼写法在精确性和多样性上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感：

我们的语言印在了宏伟的著作中：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看似简化的，但实际上却更困难的方法，——因为语言的精确度下降了，就像被擦花的硬币一样，新的拼写法违反了俄语系统中代代相承的描述性和书写形式的完整性，而正是这种描述性和完整性像一面镜子忠实地反映着俄语的形态结构。模式化的感情对我们来说是可憎的：各种各样的标准并不意味着会开始消除所有的平等。我们难道应该珍视一种将仇视传承作为唯一有效标准的思潮吗？脱离过去难道是首要条件吗？（В. И. Иванов 1967）

当然对于改革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改革之后的新拼写法中减少了发音中不支持的拼写规则的数量，比如弄清楚复数单词的性的差异需要去记一系列带ять的单词（事实上，语言学家们对带ять的单词存在争议，而在各地区不同的拼写法下呈现出一种自相矛盾的特点）。在去除词尾的ь之后，改革还带来了一些写作和排版上的节省，根据Л. В. 乌斯彭斯基的计算，新拼写法中的文字缩短了大约1/30。这项改革消除了俄语字母中完全同音的字素（ять和Е、фига和Ф, И和I），使字母更接近于真正的俄语语音系统。

Л. В. 乌斯彭斯基在他那本著名的书《词之词》中描写了“与ь的斗争”，这种“斗争”从新旧拼写法之争上升到了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

“……感谢有用的字母ь！但是直到现在，它才变得如此安静、谦虚和善良。不久之前不仅仅是需要识字的学生——全社会的人民都被这种旧拼写法压迫着、束缚着，它是强盗，是懒汉，是寄生虫。那个时候，那些最好的语言学家们对着ь写下了自己的愤怒，他们向着身处黑暗的无知的备受压迫的人们发表了热情的战斗檄文……在1918年，这个字母就经历了那些它的主人——他们都是各式各样的寄生虫、懒汉和强盗——经历过的，他们被卷入了一场决定性的战争——不要以为这场战争是简单而容易的。旧世界的人民抓着毫无意义的ь，就像抓着自己的旗帜一样……在白军占领的那些地方，将军、制造商、银行家和土地所有者们紧握权力，古老的 ер（ь的俄语名）充当了他们忠实的盟友。它进入科尔恰克，又在尤德尼希撤退，在德尼金逃亡，最后和沃伦男爵一起，在不可挽回的过去里永远离开了我们。因此，多年来，这个字母不仅在单词中，而且在我们国家的广阔空间里，都扮演着“分隔符”的角色，它“隔断”了生与死，光明与黑暗，过去与未来……”（Л. В. Успенский 1962）

苏联解体之后，在评价十月革命之后发生的许多事情上，有些“好的”变成了“坏的”，这并不足为奇。这种态度也影响到了对1918年俄语拼写法改革的评价。В. В. 洛帕汀教授曾回忆到，在一次会议上，人们称1918年俄语拼写法改革为“布尔什维克的犯罪”或者“暴力的俄语拼写法简化”。据В. В. 洛帕汀教授的回忆，在90年代中期的一次拼写委员会专门讨论俄语拼写法问题的会议上，有人甚至提出要恢复旧式拼写。“当时的拼写法被人称为‘布尔什维克拼写法’，而与会的神职人员甚至称其为‘撒旦拼写法’。”（В. В. Лопатин 2007）（因为新的前缀字母c来取代前缀字母з是苏联当局的创新，所以字母c常常被正统信徒和宗教狂热者称为“撒旦字母”）。

在 1918 年俄语拼写法改革中被删去的词尾的ъ和ять（尤其是前者），在 90 年代初被人们认为是旧拼写法，革命前俄国的象征，也象征着对苏维埃政权的反抗。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1990 年成立出版的报纸《生意人》（Коммерсантъ），在它出版发行的时候，还存在着苏维埃政权、共产党、克格勃，那时候的戈尔巴乔夫还是总书记而不是总统。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高贵”的ъ的出现像是对现行体制的挑战——即恢复已经断裂 70 余年的“时代联系”。

“复活ъ意味着对过去的继承——我们并不是从头开始建设，我们是合法的继承者。”
（A. Агеев 1995: 4）

4 关于 1918 年俄语拼写法改革的反思

通过上述一些对 1918 年俄语拼写法改革的评价，我们不难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在政治层面来看，从对抗《关于引入新的拼写法》法令开始，拒绝新的“俄语”已经成为拒绝新政府的象征。内战期间，在属于白军的领土上，没有明确地使用新的拼写方式，旧拼写法被布尔什维克们认为与旧俄国有关，而新拼写法又何尝不被白军们认为是布尔什维克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第一代移民们不承认 1918 年的拼写法改革，也许是他们觉得运用旧的拼写法是他们能与自己记忆中的祖国相维系的方式之一。但是事实上，除了一些人，还有一批的语言学家、诗人、政治家和文学家热情地欢迎并讴歌着 1918 年的俄语拼写法改革和它背后的新生政权。

从社会层面来看，改革派把拼写法当成工具，关注的是它的简洁和适用。改革派认为简化了的拼写法不仅方便俄语的书写和学习，还能节约纸张和印刷。如果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也许能更好地理解。十月革命胜利时，俄国已饱受三年帝国主义战争之苦，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在苏维埃政权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退出一战之后，如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成了当务之急，而面对当时苏联人口中庞大的文盲比例，进行文字改革，特别是简化俄语拼写法，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急需开展的基础工程之一。保守派则在每个字母中都首先看到的是一种需要被传承的文化性，所以他们并不希望俄语有什么改变。反对拼写法改革的人会有一种优越感：拼写法越复杂，掌握的人越少就越能代表一种高贵身份的象征。当拼写法脱离普通老百姓的时候，那些掌握拼写法的文化人自然成了特权一族。“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很轻易地放弃这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特权。也无怪乎保守派会在 1918 年俄语拼写法改革的时候抱怨道：如果简化了拼写法，还怎么去区分有文化人和没文化人。（郭淑芬 2006）

此外，我们认为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个是“简化是否割裂了历史”？这是一种非常具有迷惑性的说法，保守派们提出这个观点就是把文字与文化混为了一谈，苏联政权不遗余力地推广新拼写法的同时，也对重新编译俄国经典文学作品做了许多工作，退一步说，哪怕是不懂英语、法语的人也可以从翻译的文字中读懂狄更斯和司汤达。文字只是记录历史的载体。作为一个与俄国有着类似经历的国家，中国也曾经历过长时间的简化汉字的过程。这里笔者想引用一句 1935 年蒋介石在台湾说过的话：“为大众写的文字而不能大众化，那如何望其有效？我们须知文字是大众达情表意、取得知识和争取生活的工具……所以简体字的需要是生活的需要，时代的需要。”（张博宇 1974）而 1918 年俄语拼写法改革，显而易见，是当时一种俄国普通民众的生活需要和时代需要。

第二个是“文字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从文字与文化的关系上来看，文字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字是一种字理文化，笔者认为不仅是象形文字有字理文化，拼音文字也有。在长时间发展过程中约定俗成的词缀和词素也是俄语单词表义的一部分。文字的主要职能是作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并通过所记录的语言去承载文化。如果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文字是文化的载体的载体，（于全有 2019）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担心，文字系统

的改革变化并不会直接影响到文化的“好坏”。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有意识地去保护自己的文化，阐释自己的文化，结合时代主题不断为自己的文化注入新的内容，并通过教育将文化传递给下一代，这就达成了文化的传承。文化的传承并不需要拘泥于传承文化的方式和载体。

5 结语

1918年俄语拼写法改革始终处于争议的漩涡之中，但是其确实是当时符合苏联国情的一项改革措施。洛帕汀教授在自己的著作《多面的俄文》中写道：“在长远的历史中无论采取过什么样的拼写法，（1918年拼写法）经过多年的发展，假设回避了该事件的尖锐的政治性，这种新的拼写方式对于以俄语为母语的人来说已经颇为熟悉，并且非常成功地满足了现代社会的文化需求。”诚然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现在在俄罗斯普遍所接纳的拼写法也与当时1918年改革之后的拼写法有了不小的区别，但是俄语拼写法改革的总体趋势还是在往简化的方向发展。著名的语言学家、方言学家Л. Л. 卡萨特金认为，现代的俄语拼写法需要彻底的简化。但是在简化的同时要极其小心，改变应该是目的明确且对使用者有益处的。无意义地改革或者倒退是对“文化传统”的不尊重。英语和法语的拼写法够费解的，但是英国和法国并没有急着要改革。文字的拼写法改革应该紧扣是否能方便人民掌握文字、普及教育，是否有利于文字的使用者。

附注

1 委员会中除了Ф.Ф. 福尔图纳托夫之外还有当时一些非常著名的学者：А.А. 沙赫马托夫（在1914年Ф.Ф. 福尔图纳托夫去世之后接替了Ф.Ф. 福尔图纳托夫的位置，领导拼写委员会），以及И.А.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П.Н. 萨库林等人。

2 这是1912年改革的内容，并没有在1917年改革中得以保留。

3 θ(фита)来自于希腊语，它在希腊语中对应的是单词тета(θ)。

参考文献

- [1] Агеев А. Восставший «ь» [N]. Знамя. 1995, 4.
- [2] Бунин И. А.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1918—1953 годов[M]. Москва: Наследие, 1988.
- [3] Декларация прав трудящегося и эксплуатируемого народа, принятая ВЦИК(1)[N]. Газета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абочего и крестьян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03.01. 1918.
- [4] Декретъ о введеніи новаго правописанія[N]. Газета временнаго рабочаго и крестьянска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23.10. 1917.
- [5] Иванов В. И. Наш язык[A]//Из глубины.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о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C]. Париж: ИМКА-Пресс, 1967.
- [6] Ильинъ И. А. Наши задачи[M]. Парижъ: Русский Обще-Воинского Союза, 1956.
- [7] Карамзин Н. М. Аониды[M]. СПб.: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1796—1799.
- [8] Кульмана Н. Методикѣ русскаго языка[M]. СПб.: Я. Башмакова и К°, 1912.
- [9] Лопатин В. В. Многогранное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A]//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по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C]. Москва: Азбуковник, 2007.
- [10] Успенский Л. В. Ты и твое имя[A]//Слово о словах[C]. Ленинград: Лениздат, 1962.
- [11] 郭淑芬. 关于俄语拼写法改革在俄罗斯引起的争论[J]. 俄语学习, 2006(3).
- [12] 于全有. 汉字简化与文化遗产探讨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3).

[13]张博宇编. 台湾地区国语运动史料[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4.

On the Reform of Russian Spelling in 1918

Luo Xue-xin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As part of Russian writing, Russian spelling reform (Орф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реформа 1917—1918 годов) took place arou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e reform was not completed overnight. Instead, its historical origin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18th century. After several generations's efforts, the spelling reform finally went onto the historical stage in the era of Lenin and Lunacharsky. However, the spelling reform of 1918, for various reasons, was always in a stormy vortex of public opinions. The author hopes that this article can briefly review the whole spelling reform in 1918 and the extensive discussions it has brought about.

Key word: Russian spelling reform; simplified text; cultural tradition

作者简介: 罗学鑫, 男,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2019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语言文化比较研究。

收稿日期: 2019-12-07

[责任编辑: 靳铭吉]